

# 祝 贺 与 希 望

——在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吴 伯 箫

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我们经常思慕和怀念郭沫若同志。今天由乐山地区、乐山市、四川大学主持，我们在郭老的故乡秀丽的乐山举行研究郭老著作的学术讨论会，有着全国性的极为深远的纪念意义。让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包括接受邀请而因事没能到会的沙汀同志、荒煤同志），代表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祝愿讨论会圆满成功。

自己对郭老的著作研究不够，没有带来学术论文；参加讨论会，主要是来学习，同时把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作一个简要的汇报。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是去年郭老离开我们以后，为了继承他留下的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搜集整理郭老已出版的著作和未出版的文稿、书信、札记、谈话记录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党中央组织成立的。中央十分重视编辑出版郭老的著作。

委员会的组成，由周扬同志任主任，委员为于立群、尹达、冯乃超、冯至、任白戈、成仿吾、齐燕铭、张光年、李一氓、李初梨、沙汀、宗白华、茅以升、茅盾、林默涵、侯外庐、钱三强、夏衍、夏鼐、曹禹等二十位同志；后来又增加了刘大年、林林、郑伯奇、胡愈之、魏传统等五位同志。令人悲痛的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刚要召开，齐燕铭同志就去世了。不久郑伯奇同志、于立群同志又相继离开了我们。现在共有委员二十三位同志。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七个单位抽调研究人员和编辑人员担任有关方面著作的编辑工作，三个出版社又分别担任文学、历史、考古著作的出版工作。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举行的。会前办公室只根据郭老生前编定的《沫若文集》十七卷本提出了一个郭老著作的初步目录。会上对出版郭老著作如何定名，是《文集》、《全集》？还是《丛书》、《文库》？没有确定。只认为郭老的著作宏富，涉及的领域面广，以分编编辑为好。每编再分卷按时间顺序编排。全书可分三编：文学编，包括诗歌、戏剧、小说、自传、文学评论、政论、杂文等；历史编，包括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等方面的论著；考古编，收入甲骨文、金文几部专门著作以及考古论文。征集郭老未出版的文稿，不及编入总集的，将来可以出版补逸编。郭老翻译的作品，涉及的面也很广，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学、科学，量也很大，粗略估计当在三百万字以上。决定稍后另行计划编辑。各编著作或翻译，适应读者的需要，可以分别先出单行本，不列入委员会计划。

会议希望编辑出版郭老著作，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尽量照顾郭老生前亲自编辑的集子，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基本上不予打乱。如有必须调整的，调整后要加以说明。注释工作，尽量保留原注。适当增加的简明注释，如时间、地名、人名、出处，要照顾全面，按实际情况处理。

建国以后，郭老参加很多国际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郭老是总理的助手，国际友人到我国，郭老分担了不少接待任务。中日友好关系的建立，郭老做了很大的努力。在那些场合的发言、谈话，影响很大，都应当搜集整理编入总集。郭老的字写得好，题诗、题词，留下的书法墨宝遍及全国。因此，文稿的征集工作要广泛大力进行。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后，办公室即着手整理郭老著作的分编分卷目录。经反复讨论，暂定三编三十四卷：文学编十六卷（《自传》四卷若归文学编是二十卷，《自传》暂归历史编），历史编十卷（《自传》若归文学编，历史编是六卷），考古编八卷。同时征求各委员同意，书名定名为《郭沫若全集》。《文集》不好包括历史编、考古编；《丛书》、《文库》不习惯用于个人专集。

四月间发出了《征集启事》，立刻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读者的热情响应。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就收到了三百多封来信。就三百多封信的统计，有寄郭老手迹的，有寄手迹抄件、复制件的，有寄郭老著作初版本或其它版本的，有寄照片的，有寄高寄手迹、书籍的。还有提出查寻手迹线索的。也有不少来信询问《郭沫若全集》可能的出版时间，预计《全集》书价和订购办法。这些都表达了广大读者对郭老的崇敬和景仰，对《郭沫若全集》编辑出版的殷切期望。这些都增强了我们编好《全集》、早出《全集》的责任。

《郭沫若全集》必须编好，必须早日跟读者见面。但是，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任务光荣而艰巨，绝不是少数人所能胜任的。我们从通史里去找，很难找到哪个古人的著作有比郭老更宏富的。现代六十年来肯定也还没有。说读书多，有所谓“学富五车”，论著作多，有所谓“著作等身”，郭老学识渊博，论著作浩繁，何止“五车”、“等身”！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有《鲁迅全集》十卷，又有翻译十卷，都誉满中外。郭老三十四卷著作外，若再加书信、日记、翻译和将不断发现的逸文将要有五十卷巨著，很多哪是有国际影响的。《全集》出来，对中外的影响必将更大。但是，出版《鲁迅全集》，四十年还没做到完善的地步，而所投入的人力，省、市、高等院校、注释组、协作组、鲁编室、鲁研室，参加工作的编辑人员恐怕要百数千人。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成立才半年，办公室的工作刚刚开始，相形之下，我们就深深感到任务太重，力量太弱了。当然，委员会的成员，从创造社起都是郭老生前的老战友，德高望重，对郭老著作是熟悉的、有研究的；但是这些老同志，年纪大，八十的，七十的，最年轻的也六十多岁，每个同志又都负责全国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他们可以考虑编辑出版的原则问题或作发稿前的量后审定，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也不应当把执笔校订的任务推给他们。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扬同志说：“郭沫若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更主要的是依靠各研究单位、各出版社、各高等院校的力量共同协作来完成。”

因为这样，依照委员会的意见并借鉴《鲁迅全集》的编辑经验，今年春天历史研究规划会议在成都开会的时候，委员会办公室的黄烈同志曾高请四川大学历史系协作编辑几部郭老的有关历史著作，历史系同志慨然答应了，并且已经作了具体的安排。这是对郭老著作的编辑出版最热忱的支持。借讨论会今天开幕的时候，我们向四川大学党委和历史系同志表示衷心

的感谢，同时以四川大学历史系为范例，我们冒昧地向参加讨论会的各研究单位、各高等院校的同志诚恳吁请，希望同志们对《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著作也承担某一卷或某一本书的协作编辑任务。

有同志建议：借“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开会的机会，举行一次文学编编辑规划座谈会。意思是很好的。杭州大学教授孙席珍同志谦逊地说：“我是来领任务的。”从委员会编辑规划来说，也非常欢迎。但是长期考虑的编辑出版任务，不应当影响讨论会七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希望在讨论会的间隙里或者闭幕以后作些具体联系。当然编辑出版与学术研究是紧密关联的。如果能在讨论会中间挤出半天的时间，同志们对我们整理的《郭沫若著作分编分卷目录》提提意见，同时踊跃参加协作编辑，那就更好了。

我们尊敬郭老、热爱郭老、纪念郭老，让我们为编辑出版好《郭沫若全集》投入热忱，做出贡献吧！



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乐山大佛寺举行

# 关于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 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楼适夷

衷心感谢我们会议的主人——四川大学、乐山地区和乐山市，你们组织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当郭老逝世周年纪念的日子，在郭老的山明水秀、美丽雄奇的家乡——乐山，为开展郭沫若研究的工作，跨出了全国的第一步。我们得以参加这次会议，感到很大的荣幸。

郭老，最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革命文学的创始人，在他战斗的一生中，经历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光辉的创作生涯和斗争历程，其著作的宏富，不仅仅是“等身”的，简直是浩如烟海的，这是发掘不尽的宝藏。我们生长在这伟大的时代，能与鲁迅先生、郭老这样的文化巨人为同时代人，并有幸得到亲切的教导，实在是很大的骄傲。鲁迅很早就离开了我们，现在郭老又不在了，但他遗留给我们的著作，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瑰宝。如何使这些宝贵的财富，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发挥它更大的光，更大的热，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工作，编好和出好他们的著作是一件大事。

对郭老著作的编辑出版，是这次会议中大家所关心的事。我们曾就人民文学出版社范围，就建国以来郭老文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对会议作了简单的书面汇报。这个急就的汇报十分粗糙，只表示我们作为文学出版者，对郭老这样重要的文学著作，工作做得十分不够，与广大读者的要求距离很大，说不上什么成绩，如果算多少做了一些，那就是在郭老生前亲自指导下所编印的十七卷《沫若文集》。现在郭老已离开我们，编辑出版《全集》的事，再也得不到郭老亲自的指导，我们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大家了。

建国以来，现代作家的著作，用“全集”名称编辑出版的，还只有一部《鲁迅全集》。和鲁迅先生一样，郭老的每一著作，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会根据这样的认识与广大读者的愿望，决定以“全集”名义，综合地系统地出版郭老全部著作。

(1) 《全集》收录的范围，准备以1957—1963年郭老亲自编校出版的《沫若文集》为基础，并收入当时未经编入及后来新著新出的单本和散篇。在郭老长期创作生涯中，著作方面多，数量大，出版和发表的地区、报刊遍及全国或国外，同时还有大量未经发表过的手稿、书信、札记、佚文，要在较短时间全部收辑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首先计划就上述范围编出《全集》，并准备把大量的译文、佚稿、佚文，初步另作处理，以后再收入《全集》的“续篇”、“补篇”以至“新编”。

(2) 我们考虑《全集》的对象，首先应该是广大读者，因此收录著作所根据的，都以郭老生前亲自校阅订正过的最后版本为准。郭老对自己著作的出版十分郑重，历次新版，都亲自作过或多或少的修订。了解这种修订的情况和过程，对研究郭老著作极为必要，但我们

编印《全集》不可能全部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校勘记。我们准备只在重大处所，用注解方式作必要说明。至于某一著作不同版本的全面校勘工作，则有待于在有条件有力量的情况下，专门以研究工作者为对象，另出校勘本，以满足专门研究的需要。

(3) 《全集》著作的编排，首先以分类为纲，然后依各著作最初出版时间之先后，分别编目。自编各集中，在分类上有混合的，则以自编为主，非必要不打乱原编内容，以保持原来面貌。有些作品篇末所署写作时间，是作者在编《沫若文集》时新加上去的，大都出于记忆，没经过进一步查证，有时可能有出入。在编《全集》时，将一一考核，但不修改原署，只在注解中说明。

(4) 《全集》准备尽可能增加必要而简明的注解，包括作品的出处时间，比较生疏的人物、社团、书刊、事项，偏僻的典故，难解的用语、方言或外文，或是写作的背景，但不作臆测的疏解和评断，也不作与正文无关的常识性的铺叙，并努力保持注文的简练。凡《沫若文集》中作者自注或经作者校阅过的编者注，一律予以保留。郭老文字明快，需要加注处可能并不太多，但由于篇幅浩瀚，即使尽量要求简要，工作量仍是很大的。我们吸取《鲁迅全集》注解的经验教训，要求尽力少走弯路，能够尽快提早完成，准备走群众路线，吁请各方面有力量的专家大力协助。现在编委会办公室力量极为微薄，主要还依靠各地科研机关、高等院校的专家。我们想通过这次会议，和各方面取得初步联系，首先疏通情况，征求意见，以便今后进一步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

(5) 《全集》的出版将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家联合进行。为了纪念郭老，学习和宣扬他留下的宝贵财产，满足广大读者及专家们的迫切需要，我们将尽可能缩短编订、校释、定稿、排印的时间，争取早日与读者见面，但为了求得工作的慎重和细致，尽可能地完善，多向各方面征求意见和帮助，一定的过程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要求在《全集》出版以前的一段时间内，依靠全国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央、地方的出版部门，能够在全国一致的统一筹划之下，分工协作，广泛出版郭老的著作的白文单本、选本、各种注解本、校勘本，乃至包括此次《全集》不能收入的译著、书信、手稿及各种类各时期的佚文，都能尽快地陆续地编印出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郭老逝世以后，郭老著作编委会成立计划出版《全集》之前，就作了出版郭老著作单行本二十八种的规划，这规划现在仍照常进行。同时对郭老的文学译著，也在北京与上海两地陆续印行。我们希望各省、市、自治区的出版社也能分工进行这项工作。这次我们到四川来，见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老逝世纪念诗文集《呼唤春天的诗人》，并知道郭老家乡保存的十分宝贵的郭老青少年时期创作的诗稿，也很快可以印出来，这使我们十分高兴。四川是郭老的故乡，我们十分赞赏四川方面担当起这个重大的责任，同时也希望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依照条件的可能，也能担负起出版郭著的部分任务，与中央出版社共同协作，把这一工作做得又多、又快、又好！

(6) 郭著编委会现在除了积极进行《全集》工作之外，同时也已开始进行郭老著作版本、散篇、手稿、佚文、文物资料的征集工作。这既是为了编《全集》的需要，同时也为将来成立郭沫若纪念馆作初步准备，各方面保存有这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愿意把资料提供给我们的，我们表示十分的欢迎；有的还需要自行保留的，也希望将品类、名称、目录、名单和内容情况告诉我们，使我们了解各方面收藏的情况，或者在必要时可以允许我们借用、摄影、复印或复制。最近我们已在全国主要报刊发布过征集资料的启事，更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地单位和同志，给我们以有力的协助。

(7) 在这次会议中，有同志提出应该组织、编辑、出版郭沫若研究资料。这个工作对我们今天更好地编印郭老著作，特别是进行郭老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我们郭著编辑委员会应该考虑承担起这个任务，同时特别希望各方面共同来做。委员会目前由于力量关系，暂时还没有出资料丛刊的规划。我在这儿向大家介绍一个刊物，那便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刊的《新文学史料》丛刊。这刊物专门发表新文学史料，也许大多数同志已经见过。我们这个刊物每期都发表关于鲁迅研究的资料，现在还打算同时每期有郭老研究的资料。由于刊物的性质和任务，我们只发表史料、回忆、记事，……等等，不包括研究著作，但资料提供的目的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使这刊物和各方面取得联系，请大家大力支援我们，给我们写稿，依靠大家的力量，把有关郭老的史料，很快地发表出来，并为将来创办郭沫若研究资料丛刊打好基础。

以上提了七点，有的只是介绍情况，有的提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供大家讨论，并向大家征求宝贵的意见。我们十分感谢会议领导小组特地拨出会议的宝贵时间来讨论《全集》的问题，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大的支援。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都对会议的成功做了不同的贡献，可是我们不仅未尽什么力量，却相反地只是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实在觉得很愧疚，但愿在各方支援之下，早日在编印工作上做出一些成绩，把郭著出好，这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

## 郭沫若研究室成立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加强郭沫若研究工作，继在乐山举行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后，我校于六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郭沫若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吴伯箫，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楼适夷，老作家段可情、戈宝权，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原郭沫若同志的秘书王廷芳以及郭沫若同志的女儿郭庶英、郭平英等同志出席了郭沫若研究室成立大会。吴伯箫和我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许琦之同志在会上

讲了话，祝贺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郭沫若研究室的成立。

研究室成立后，将立即着手进行以下几项工作：一、编选《郭沫若选集》五卷本，由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与学报编辑部合编《郭沫若研究专刊》，不定期出版；三、受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委托，参加《郭沫若全集》的注释工作，初步商定承担十卷的工作量；四、编写郭沫若年谱和评传。研究室的同志们决心奋发努力，坚决贯彻“二百”方针，把郭沫若研究工作搞好。

(曹力)

# 光辉的一生 深切的怀念

——在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王 廷 芳

去年的今天，敬爱的郭老离开了我们；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家乡召开这样一个关于研究郭老的学术会议，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对郭老的学术研究，在他生前和逝世后，各研究机构和大学已经进行了一些工作；但是，全国的学术研究人员，聚会一堂，把研究成果，集中起来，进行讨论，这还是第一次。这对于进一步研究郭老，对于郭老著作的出版，都会起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我们还可以去参观郭老诞生和青少年时代学习、生活的地方，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对于郭老生平著作没有什么研究；我是来向大家请教，向大家学习的。自己在郭老身边工作二十多年，现在我把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郭老在一九三九年，曾三次回乐山和沙湾。三九年春天第一次回到乐山，时间很短。一九一三年去日本前回过一次沙湾，直到这时才又回家乡。这年夏天，父亲去逝，他同于立群同志一起又回到沙湾；郭老在家停留一段时间后又回重庆，于立群同志就留在沙湾；不久，郭老又来沙湾，办理父亲丧事。此后，直到他逝世，就再也没能回来了。但他经常怀念自己的家乡。他经常向我们讲家乡乐山的情况，讲乐山的凌云山，大佛寺，乌尤寺，沙湾，大渡河，茶溪。郭老到了晚年对故乡就更加怀念，怀念故乡的乡亲们，很想回来看看。六六年四月中旬，郭老、于立群同志，我们一起都到了成都，就是准备回乐山和沙湾的。当时西南局和省委领导同志说，郭老回来一次不容易，希望他多在四川停留一段时间，看看四川的建设，也看看他的家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和学习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先去了西昌和渡口。这年的五一节是在成都过的，过了节就准备回乐山。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在这时，北京来了电话，说有紧急事情，需要回去。回北京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但是，他时刻想念着自己的家乡，特别一九七四年他生病以后，曾多次讲，等他身体好一些的时候，一定要回家乡看看，回来看看沙湾，看看沙湾的亲人们。……

这次，自己能到郭老的家乡来，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对郭老的很好的纪念。

现在，我把了解到的关于郭老的一些情况讲一讲；自传中讲到的内容，我就不讲或少讲。

郭老在日本留学时，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期间，就较早地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并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到了一九二四年，他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并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他从此“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答青年问》，载《文学知识》一九五九年六月号）。

依定先赴歷東而南下江  
 縣。作大森相標之北  
 高對其軍 龍我 至黃  
 吟風而際生也 會所  
 首重其德 志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转化和发展，从宣传革命而投身到革命的实践斗争中去；他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高潮中，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并同许多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所接触和交往。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那一天，郭老离开上海，经海路到了广州；他是应林伯渠同志之约去的。到广州后，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去广州的还有郁达夫等人。

据我们所知，这段时间，郭老与毛主席会见过四次。

他三月二十三日到广州，成仿吾迎接了他，给他安排了住处，然后他就去拜会林伯渠同志，但林老不在家。刚到林老家不久，毛主席就来了，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当时广东比较乱，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毛主席很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广东和全国的革命运动的情况；接着林老回来了，毛主席又和林老简单地谈了几句，就走了，这是毛主席和郭老的第一次会见。

在此期间，毛主席曾邀请郭老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做过一次报告。在报告之前，

毛主席亲自到郭老家里去洽谈，向他发出邀请。作报告时，毛主席又亲自陪同着他。这是他们第二次和第三次见面。

当时广东有个东山青年会，请了三个人讲演，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郭老，还有一个是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原排列讲演的顺序是，郭老，毛主席，最后一个马伯援。但马伯援耍了个滑头，他说他有事，要先讲，否则就讲不成了，他便先上台。他在讲话中对马列主义进行了肆意的诋毁，然后扬长而去。郭老接着便登上台，痛斥和批驳了马的谬论；这是郭老第四次同毛主席在一起。

郭老同周总理也是在广州认识的。郭老是三月底到的广东大学；四、五月间周总理去广东大学讲演，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郭老参加北伐，主要还是周总理的影响和鼓励的结果。

当时革命的中心是广州。很多文学艺术家和文艺爱好者都到了广州。据阳翰笙同志回忆，有一次他和李一氓对郭老说：北伐军快要出发了，郭先生，我们一起参加北伐吧！郭老当即表示同意。那时，阳、李二位已是党员，郭老还不是。阳、李就向总理报告了这个情况，总理对这件事很重视，说郭老如能参加北伐，政治影响将是很大的。总理即约郭老到自己家里来，两个谈的很投机，很高兴。于是就决定让郭老的好朋友孙炳文同志出面同蒋介石和邓演



达推荐郭老到北伐军政治部工作，担任北伐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这是一个很有实权，也很重要职务，宣传工作是政治部主要任务之一。当时蒋介石已开始排共，不愿意让共产党员担任这个职务，但国民党里面也没有人有能力可以胜任此职；郭老任此职，他们也还通得过。炳文当时向郭老讲，这个职务虽低，但作用很大；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多做工作，而不空图虚名。郭老表示，只要有工作干，职务高低，他是不在乎的。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他当时地位很高，名气很大。为郭老担任此职，政治部还召开了一次类似政治部部务会议的会，周总理亲自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称誉郭老的才干，强调他能胜任此职；总理的用意是怕邓演达不尊重郭老。

据郭老自己回忆，他参加了北伐军，在广州只停了十天左右，就出发了。出发前，军装一直未发下来，所以他当时已身为军人，而穿的却是大长袍。他七月间随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九月间到达武昌城下，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就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中将。

从广州出发后，李一氓同志一直和郭老在一起，做他的秘书；当时北伐军政治部党的负责人是聂荣臻同志，他们也是经常在一起的。

郭老生前对我讲，当时林老约他去广州，这是林个人的意思呢，还是党组织的意思？郭老晚年认为；他的去广州，是党组织的安排。陈抱隐先生曾告诉郭老，此事是瞿秋白同志推荐的。据阳翰笙同志说，郭老去广州，是秋白同志的推荐，由组织上安排的，虽然细节不知道，但这两点是沒有问题的。

另一个问题是，他到广州的当天就见到了毛主席，郭老也认为这可能是有意的安排，而不会是巧合和不期而遇。郭老晚年说，只是估计如此，因这些老人都不在了，没法证实。

现在讲一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的一些情况。郭老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朱老总家里写的。这篇文章写在“四·一二”的前十几天，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并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治面貌。他还写有另一篇文章，名叫《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是四月一日写的；现在还没有找到，希望研究者能找一找这篇文章。当时，在“四·一二”以前，虽然蒋介石已经开始镇压革命了，如九江事件、安庆事件等等，但他本人还伪装革命，他的反革命面貌是在“四·一二”事件中才完全暴露出来的。郭老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的真实的反革命本来面目，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郭老写了这篇文章后，打扮成绅士模样，四月十四日到了上海，第一站先到内山书店，即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里。当天李一氓同志乘汽车将郭老接到了他的家里。当晚在李一氓处，郭老见到了总理。总理把上海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郭老主张到武汉方面去组织力量，打倒蒋介石。总理觉得郭老的这个意见很好，当晚就把他送到另一个住处。四月十五日离开上海，坐了一艘外国的轮船，经过南京时，南北两岸正隔着长江在交火。船便在江心停了四、五天，然后到了武汉。郭老在“四·一二”前后虽然不是党员，但他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总理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的。他当时对总理就特别敬佩和尊重。

关于郭老参加南昌起义问题。了解这一段经历，对我们研究和认识郭老也是很重要的。“八一”起义的当天，郭老并不在南昌。当时他在九江；南昌与九江之间已经封锁，郭老冒着生命危险，赶到南昌去参加起义队伍。他在去南昌途中，曾受到散兵的袭击，几乎丢了性命。

他是八月四号晚上赶到南昌的。五号，就随起义军离开了南昌，经临川、瑞金、汀州，到

达汕头。他当时的职务是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就在这次行军途中，由总理和李一氓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到达汕头地区不久，战斗失利，郭老即乘一只渔船到了香港，再回到上海。

郭老参加南昌起义后，蒋介石对他下了通缉令。何时回到上海？他在文章中写了几个时间，准确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中旬。我曾问过郭老，郭老说这个时间比较可靠。

回上海后，他很快同总理取得了联系。起初是决定他到苏联去。当时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很紧张，苏联领事馆要全部撤回。郭老准备乘苏联撤回领事馆的轮船去苏联，但由于突然患斑疹伤寒，未能成行。

郭老在《离沪之前》一文中（见《沫若文集》第八卷第257页至258页），有几处提到总理，很重要，我摘引几段：正月十九日日记中写道：“中午将近时，民治（按：即李一氓同志）来，交来豪兄（按：即恩来同志）答函”（《沫若文集》第八卷第261页），说明在这以前，他们就已经有了联系。二月九日日记中又说：“定十一号走（按：即去日本，然后去苏联）。……豪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沫若文集》第八卷第276页）就是说，走以前，一定要见到恩来同志，否则，就走不成。说明他之去日本，是在总理指示下安排的。二月十日总理来了。这天的日记中写道：“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仿吾亦来，约了初梨等来谈话。”（《沫若文集》第八卷第276页）显然，这次会见很重要，他是在同恩来同志会见谈话之后，才去日本的。郭老曾对我说：总理要资助他一部分钱，他坚决不要，说组织上现在也很困难；创造社可以在经济上给他一些接济。从这些事实来看，郭老是在总理的嘱托和安排下去的日本。

郭老到日本去，本来是打算经日本去苏联的。但到日本后不久，即被日本警察发现并扣押；虽然几天后即被释放。但从此，他就处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双重严密监视之下，因而去苏联是根本不可能了。从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三七年夏，他在日本东京的郊区于叶县市川市须和田这个地方度过了十个年头。这十年中他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同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积极支持了国内文化界的革命文化活动，他还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和文艺作品。

再谈谈郭老是怎样从日本回来的。

郭老经常和我讲：他在日本十年，就好像是住在一个大的监狱里，他的行动受着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他随时都在密切注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国内发生了什么事变时更使他坐卧不安，焦虑难忍。他多么怀念自己的祖国啊！多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蒋介石的通缉，日本警察宪兵的监视，使他有翅不能飞，有国不能归。

卢沟桥事变以后，郭老之所以能从日本回国，是利用了一个矛盾。我们知道，郭老在日本时，对甲骨、金文的研究颇有建树。当时日本政界有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名叫西园寺公望，是元老，说话影响很大，但政治上比较保守，他对郭老的古文字学研究著作很有兴趣，十分赞赏，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搞出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日本报纸就把这个消息当作新闻报导了；国民党也乘机大肆宣扬这个消息。他们大肆宣扬此事，是为了诋毁郭老，想证明，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搞到一起去了，当了汉奸了。这件事，不久也就过去了。但到了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如张群、何应钦之流，想同日本拉关系，他们便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便设法请郭老回国。这样，国民党

才在“七七”事变后，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同志们也希望他能早日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郭老就毅然冒着生命的危险，躲过警察和宪兵的监视，抛妻别子秘密地回到了祖国。具体帮助郭老回国的是画家钱瘦铁和金祖同二人。钱瘦铁当时在日本有点地位，公开活动不方便，金祖同也搞点文字学研究，和郭老平常有来往，帮了不少忙，是他具体安排和陪同郭老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郭安娜当时对郭老的回国也是完全支持的，而且帮了很大的忙，这一点郭老生前不止一次讲过，也不止一次写过。

回国后，郭老就一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解放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我就不多讲了。

下面再讲讲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是如何迫害郭老的。

当时，“四人帮”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知道，郭老从大革命起就同总理关系很密切，很好，他们就想从郭老身上开刀，达到他们攻击总理的目的。因此他们就把郭老看作斗争对象之一。两校大批判组把郭老的著作，作了摘录翻印，发下去，再由下面反复翻印，打算大规模地对郭老展开批判，这件事被毛主席发现后制止了。毛主席指出，不能批判郭老。但“四人帮”不听，仍然在“一·二五”一万八千人大会上，点了郭老的名，当时总理也在场，他们的矛头是针对总理的。毛主席说不能批，他们还是要批，他们的矛头也是针对毛主席的。在这个大会上，把郭老喊起来，站着，这对郭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原来他们要批郭老，还是少数人知道，现在他们在大会上点名，就在社会上公开了。

在这次大会的前后，总理曾经两次到家里去看过郭老。总理都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他自己也要研究研究郭老的著作。总理说，他没有发言权，因为他没有读书，读了书才有发言权。总理还对我、对郭老的子女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读了书才有发言权，要不，就没有发言权。

张春桥在“一·二五”大会以后也来了一次。他张牙舞爪地指责、批评郭老抗战时骂了秦始皇。郭老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把张春桥顶了回去。但“四人帮”并不甘心，他们组织了大量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郭老。

在“一·二五”大会后的当天晚上，总理派人来，指示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而且具体地指示了四条，第一条是，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条，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小的卧室中搬到房子里去住。后来总理见到郭老时，对郭老说，为什么让你从小房子搬出来呢？因为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条，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条，具体工作，由我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我负责。我听了总理的指示，感动的不得了。郭老听了总理的指示，也感动得连连说了几声“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郭老，但万恶的“四人帮”却对郭老进一步地进行折磨和迫害。叛徒江青，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号的下午找上门来，纠缠和折磨郭老，她逼郭老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安东尼奥尼《中国》为名，指桑骂槐地影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她在郭老家中东拉西扯地纠缠了两三个小时，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走。郭老当时咳嗽声不断，很少和她答话。当天晚上，郭老就病了，开始发烧。我们马上把医生请到家里来。大夫给他打了针，但烧仍旧不退，反而继续升高。我们就建议他住院。他这时已经脱衣就寝，说：明天再去吧，这么晚了，太麻烦了。大夫说，那可不行。我们便把他抬上救护车，

让他住了院。他这时温度已经从三十八度升到三十九度多，烧得迷糊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郭老的生命到了危险的边缘。

我们敬爱的总理，每天几次过问郭老的病情，经常派他的医生到医院看望，并亲自指挥抢救。在这种情况下，郭老被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了。但从这次发高烧以后，种下了肺炎的病根，在此以前郭老是没有得过肺炎的。这以后，肺炎就反复发作。又经过了几次危险，都闯过来了，这说明，郭老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这年七月份，郭老又经历了一次危险，因打针过敏，烧到四十度，几乎要休克了。这是第二次危险。总理知道后，每天要过问好多次，组织人员抢救；为此，总理还亲自指示说：对老年体弱的病人，用新药要慎重。必要的时候，事先要做试验。

第三次危险发生在总理逝世以后。总理的逝世，对郭老影响特别大。郭老当时住在医院里，经常挂念着总理，从照片上看见总理瘦了他就特别难过，总理不接见外宾了，他就更加不安。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他听后当时就不会动了，心情极其悲痛，木然地坐在那里，象傻了一样。他对我说：我一定要去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总理的追悼会，我一定要参加。这之后，他又经历了一次危险，这次病发作得比较厉害，但仍然抢救过来了。

总理这样关怀、爱护郭老，郭老也是非常尊敬爱戴总理。总理逝世后，我们在郭老面前，谁也不敢提起总理，一提大家都哭起来。总理的逝世，的确对郭老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郭老非常兴奋，他说，我们又得到了一次解放！他的精神完全两样了，和前几天比较，简直判若两人。他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是为党除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并奋笔疾书，写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他当时身体仍很不好，住在医院里。他抱病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在天安门城楼连续站了两个小时。我们和大夫都觉得这是奇迹，简直不可想象，因为他平时站几分钟都感到困难，——这是多么大的精神力量啊！他身体这样不好，打倒“四人帮”后，还写了那么多东西，真是不容易啊！但是，毕竟他年纪太大了，健康损害太严重了。七七年这一年还算不错，到七八年初以后，他的健康情况就愈发不好了，肺炎频繁发作；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抱病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当时大夫只准他参加半个小时的会。华主席和邓副主席也对他说：你只能参加半个小时的会。新华社发了一张华主席劝郭老回去休息的照片，照的就是郭老参加大会已过了半个小时，华主席走过来提醒他，劝他回去的情景。当时他就是不走，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不走！怎么办？我们几个人便上去把他连同他的坐椅一起抬了出去，这样，他才离开。郭老对待工作，对待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底，六月初，全国文联开扩大会议时，郭老有一个书面发言，六月日一大早，他问我文联的会开的怎么样？周扬同志来过吗？我说，听说会开的很好，周扬同志昨天晚上来了，大夫说，你的精神不好，不同意会客。他听后，说，我这不是挺好吗？太失礼了。我说可以打电话请他来。他考虑了一下说，他很忙，这太麻烦他了。我说我和周扬同志在电话上商量一下，他表示同意，我就给周扬同志挂了电话。周扬同志很快来到医院。郭老详细地问了会议的情况，一再表示不能亲自参加大会很不安，请周扬同志代向与会的同志们好。周扬同志说：你是我们中国的歌德，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大家都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领着大家前进！郭老很幽默地说：我是什么国宝，我是“郭宝”；你做了很多工作，我没有

做什么工作，很惭愧。

郭老身体，愈来愈不好，医院多次向我们打招呼。但郭老那么快离开我们，我们还是感到突然。他六月十一号中午又开始发烧，体温降不下来，第二天早晨，情况已经很危急。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很快要和大家永别了。这时郭老握着于立群同志的手说：“时间很重要啊！”他又很吃力地重复了一句：“时间特别重要！”休息了一下，他又对我们大家说：“要相信党，要相信真正的党！要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这最后的遗言，我们要永远牢记。

在他弥留之际，中央领导同志和很多老同志都来看他。十一时左右，张光年同志也来了，他哭着高声地对郭老说：“郭老啊，全国文艺界的同志们都特别挂念你，想念你，你一定要保重啊！”郭老听懂了，很艰难地说了“谢谢”两个字，就不能再说了。

下午四点钟左右，华主席来看他，当时他呼吸已经很困难了。我靠近他的耳边对他大声说：“郭老，华主席看你来了！”他看来还是听懂了，他用力睁大眼睛，嘴动了动，没能说出话来。而后，不到一小时，他就离开了我们。

我在郭老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在郭老身边度过了自己前半生的大半。我没有做多少工作，但自己对郭老的感情是很深的。二十多年来我们朝夕共处，无话不谈。特别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在家里或在医院里，把门窗关上谈知心话。我感到，郭老是我们的领导，是我们的长辈，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亲密的同志和挚友。郭老那种为中国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今天，在郭老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感谢会议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使我能表达一下自己对郭老敬爱和深切怀念的感情。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有力地促进郭老全集的出版工作及

对郭老的学习和研究。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于乐山）

## 回 忆 父 亲

郭庶英 郭平英

这次，我们有机会参加四川大学和乐山地区、乐山市联合主办的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因为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回到家乡——乐山，实现了多年的愿望。看到故乡的山水，见到亲切热情的乡亲，我们禁不住热泪盈眶。就是这里的山水和这里的人民养育了它的儿子郭沫若，也养育着我们这一代。

来到乐山不久，就听到家乡的老人回忆父亲一九三九年回家的情景。当时大家请他讲演，他站在一张用方桌临时凑成的讲台上，第一句话就说：“离别了二十六年的家乡父老兄弟们，我是一个不肖的子孙……。”爸爸这样说是由于他对家乡的爱，对家乡人民充满感激崇敬的心情。而今天，我们要说：真正的不肖子孙是我们，我们才是真正的不肖子孙呵！我们没有珍惜和爸爸一起生活的那些时间，没有自觉地吸取他身上那些可贵的东西。现在同志们要我们讲讲有关爸爸的情况，我们感到很惭愧，加上会前没有准备，只能凭记忆，就日常的接触，也可以说是一些生活琐事，谈谈他的生活作风，他对群众的态度，以及他是怎样地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革命，作为我们对他的怀念。

解放前，父亲在生活上经受过许多的艰苦波折，这在他的自传中已写了很多。我们只能讲讲我们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天官府四号——我们在重庆时的家。这是一所很破旧的小楼，我们住在三楼上。沿着木板的楼梯爬上去，每走一步，似乎都感到房屋在颤动；房间隔墙上的白灰，大块大块地脱落下来，木条就暴露在外面，地板的板条之间有着很多的缝隙。听妈妈说，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汉英、庶英、世英、民英，年纪都小，常常淘气，有时不小心把尿盆打翻了，尿顺着楼板的缝隙滴到楼下，搞得邻居很不高兴，爸爸妈妈也十分不安。那时的家具也相当简陋，同志们从《沫若文集》第三集照片中看到的书柜，就是用四个木箱子垒起来的。但就在这所破旧的小楼上，爸爸从事了大量的创作。著名的《屈原》、《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就在这里写成，《甲申三百年祭》、《十批判书》也在这里写成，还有许多许多的诗文都诞生在这小小的“蜗庐”里。

那时家里是不宽裕的，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生活要求也很严格。在我们的记忆中，妈妈给我们的最好吃的东西是盐水煮毛豆和甜米汤。一次，爸爸妈妈带我们出去，当时正是梨上市，满街都是梨，但妈妈为了减缩开支没给我们买。半路上，世英却提出要求说：“妈妈请我吃面哟！”妈妈说没有钱。世英说：“你把身上的衣服脱了卖掉，就有钱了么。”妈妈把

世英的话讲给爸爸听，爸爸笑了，把衣袋里的零钱掏出来给世英。世英见了很高兴，但马上就害羞地躲到妈妈身后去，知道自己不对了。民英很乖，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但到底年纪还小。一天妈妈带他上街，他看着商店里摆着那么多自己从来没吃过的好东西，真吸引人呵，他知道不该让妈妈买，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地说：“妈呀，我怎么总有这么多口水往肚里流呀？”

抗战期间，文化界的朋友们云集重庆。党组织时常在我们家召集座谈会或传达中央精神。爸爸妈妈知道，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所以当同志们在家里聚会时，爸爸妈妈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把平常舍不得吃的东西做来请大家一起吃。好多同志都把天官府四号看作他们自己的家。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的照顾，家里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爸爸妈妈时常提醒我们，不要贪图安逸，不要随意浪费。爸爸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九四八年底，他和一些同志乘船离香港北上，途中遇到一位打渔的老人，他们用大米向老人换了些鱼。爸爸对这老人说：“今晚你回家可以吃顿大米饭啦！”老人却说：“那里哟！大米得留着过年，今天吃了，过年就没有吃的了。”爸爸在《渔翁吟》这首诗里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诗中这样写着：

.....

翁见大白米，怡然笑颜开。自言不见者，于今已数载。南人还慰问，今夕可加餐。  
翁言吾敢岂，留以过新年。

.....

翁言感我心，吃饭良艰难。我辈何德能？饱食尚思鲜！无怪古之人，训彼有悬瓠！

爸爸用这件小事告诉我们，解放前劳动人民要吃到一些大米是多么不易，现在同过去相比是多么的不同。他常常感慨地对他说：“我们现在每天都象在过年一样啊！”

爸爸妈妈一直保持着吃野菜的习惯。每到春天，就带我们出去采些野菜回来。直到爸爸最后这次发病，我们都和过去一样，把做好的野菜送到医院去。爸爸别的菜吃不下，但总要吃几口爱吃的野菜。家里最常吃的野菜有二月兰、枸杞芽、马齿苋等。二月兰是一种很好吃的野菜，爸爸在《百花齐放》这本诗集中还特意给它写了一首诗歌，欢迎人们放下一点身份，都来和这不知名的草花打打交道。诗的题目就是《二月兰》：

在群芳谱中自然找不出我们，	既不要你们花费任何劳动来栽，
我们野生在阴湿的偏僻地面。	也不要你们花费什么金钱去买，
素朴的人们倒肯和我们打交道，	只要你们肯放下一点儿身份呵，
因为摘去我们的嫩苔可以佐餐。	采过一次，包管你们年年都会再。

爸爸平时的衣着很朴素，出国用的服装也总是自理，不要国家多花钱。去年年初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穿的是一件对襟的蓝丝棉袄，扣绊已经磨断了。平英到医院去看他时，他要平英用线帮他缝好。但医院里一时找不到深色的线，只有白的。平英便扯了一段白线，用蓝墨水染过，跪在爸爸的膝旁，把扣绊缝起来。爸爸低头看了看缝好的样子，安然地点点头，说了声：“好。”这就是他去世前穿的最后一件棉袄。

一九五一年，爸爸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共十万卢布，全部捐给“科大”，作为“抗美援朝”的经费。一九五三年，爸爸和妈妈又把自己收藏的两千多册图书送给北京图书馆。五十年代时他们向组织提出停止核收版税；以后又将所得的稿费先后捐献给灾区人民、科技大学和作为党费交给了科学院党组。

如果同志们有机会到我们家里来，可以看到院中影壁上四个醒目的大字——毛主席手书“艰苦朴素”。这四个字是爸爸妈妈特意选出请工人同志们临摹在墙上的。爸爸在院中散步时，几次对我们说起，毛主席这几个字写得好，意思也好，摆在这里真是合适。现在爸爸妈妈都已不在了，但这四个字仍然在。我们要象爸爸妈妈一样，把这四个字作为我们生活的座右铭。

## 二

解放后，父亲担任的职务多，工作忙，他一直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同群众直接接触。近三十年来，大量的群众来信始终是他亲自拟稿处理，或认真回答来信中的问题，或诚恳率地提出批评，都非常及时。

一次，有位残废军人来信说，在爸爸参加朝朝慰问团的时候，他曾经担任警卫工作，很想请爸爸题字，可是当时首长曾经嘱咐过不要劳累慰问团的同志，他便一直忍着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后来这个同志在战斗中负了重伤。爸爸接到这封信后，即刻题了字寄去，满足了这个普通战士的心愿。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同志写信来，说他耳朵不好，经济条件又不充裕，请求爸爸送他一副旧耳机。可是这位同志连父亲的名字也写错了，写成“郭莫诺”。爸爸毫不在意，他让工作人员了解这个同志的实际情况，把耳机送去了。庶英有个同事的父亲是个退休工人，耳朵不大好。庶英问爸爸能不能找一个耳机送他。爸爸立刻同意了，并且让庶英和他一道在耳机匣里找。庶英说：“不必找很好的，只要是你不用的就行了。”爸爸很认真地说：“这怎么行！自己不愿意要的东西怎么能送人呢？”最后还是爸爸选了一个比较好的，送给了同事的父亲。

爸爸是很平易近人的，他常常自称“老兵”，而且不希望别人称他“郭老”，他说：“把‘郭老’这两个字颠倒一下嘛，叫我‘老郭’好了。”可是他对那些年老的工作人员，对打扫卫生、烧锅炉的老工人却很尊敬，带头称他们“郑老”、“陈老”……。现在爸爸已经不在世了，但这些称呼一直延用在同志们中间。

一九七七年底，庶英出差到合肥，回过几次母校——中国科技大学。科大的同志们十分怀念老校长，带信问候爸爸。他听到学校的情况，同样也增加了他对学校的惦念，他对庶英说：“等我身体好起来，要到安徽去住。”庶英说：“安徽很热，你身体受不了。”爸爸却说：“那么多同志都在那里住嘛！”爸爸的病经过几起几伏，身体已经很衰弱了，他的愿望虽然不可能再实现，但他的心始终和群众在一起。

一九七八年三月，爸爸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群众大会。值班医生很了解爸爸的健康情况，他为爸爸能重新站立起来而高兴，同时又不免担心，劳累会使他病情加重。他们把父亲一直送上汽车，但不慎被车门压伤了手指。爸爸立刻询问伤得怎么样，医生和秘书都瞒着他说：没什么，不过伤了点皮。爸爸开会回来，刚进病房又一再追问。同志们只好如实告诉他，医生右手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压伤了。他十分过意不去，要我们给医生送个大蛋糕去代他表示慰问。这时妈妈考虑得更周到，说大蛋糕要一家人团圆时吃才好，现在医生的爱人正在科技大会搞医务，不能回家，还是送些好保存的食物去。于是我们



连晚上街买了一盒巧克力糖送去。爸爸一直等到我们回来，才肯休息。以后，他又几次问起医生的手指恢复得如何，会不会影响今后的工作。后来，爸爸亲眼看到这位医生的手基本痊愈，仍然能够诊查病情，才算放了心。

爸爸的很多作品都记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西湖纪游·雷锋塔下》中的一句话极为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劳苦农民的深厚感情：“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爸爸的一生对劳动人民充满真挚的感情，他不愧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 三

爸爸为了革命事业，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的一切。他说过的一句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极深极深，那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世英被迫害致死后的事。当时世英在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农大是王、关、戚插手最深的一个高等院校。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早晨，农大一伙人把世英非法绑架关押，三天以后就被迫害致死。世英的去世，对于年老的爸爸和妈妈是一次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这已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失去的第二个儿子了。妈妈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悲愤，她痛骂农大那群目无法纪、惨无人道的歹徒，痛骂那些身居中央文革却到处煽动是非、草菅人命的大人物。但这在当时能有什么用处呢？妈妈由于过去的长期白区工作的积劳，从一九五三年以后就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心脏病。这接二连三的猛烈打击对她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她在极度的悲哀中忍不住责怪爸爸在世英被绑架的当天，为什么见到周总理也不向总理讲一讲呢？确实，就在四月十九日这天的晚上，爸爸参加了由周总理主持的一次外事活动。爸爸就坐在总理旁边，心中充满对世英的悬念，但他没有对总理讲，什么也没有讲。现在，面对着妈妈的责难，他仍然沉默着，过了好一阵才颤抖地说出一句话，“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他再说不下去，站起身来走了出去。我们望着他的身影，望着那已渐渐变驼的背脊，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我们觉得，只有从这时起，我们才真正开始了解我们的爸爸。爸爸决不是对世英没有感情，在我们兄弟姐妹中间，世英最喜欢文学，他很早以前就可以写诗，写剧本，常常和爸爸一起讨论问题，而且他的性格豪爽，一旦知错，改正得最坚决，所以爸爸格外喜欢他。但是，爸爸在世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家庭，而是整个国家。爸爸知道，总理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一直处于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的围攻之中，总理身边的人几乎都被停止工作，一人承担着全部繁重的国务。爸爸不愿在这种时候，再拿自己家里的事去劳累总理，牵连总理。第二天爸爸想方设法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但万万没有想到，第四天早晨在我们赶到农大的三个小时以前，世英已被迫害含冤而死了，他遍体伤痕，手腕、脚腕被绳子捆绑得血肉模糊……世英分明是被迫害致死，但把持农大领导权的一小撮坏人竟组织人编写世英的所谓“罪行材料”，给他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周总理得知世英去世的消息非常痛心。他到家里来安慰爸爸妈妈说，“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总理又先后两次派联络员去调查，但在“四人帮”横行的当时，两次都没有结果。爸爸深深理解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只是怀着巨大的悲痛，把世英生前的日记用毛笔工整地抄写了一遍，一共抄写了八本。直至爸爸去世，这八本日记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爸爸虽然没有活到世英白雪的这一